天才画家梵高如何走向疯狂

□ 郑渝川

“我总是全力以赴地画画，因为我的最大愿望是创造美的作品。”“我认为这是伟大人物经历中一幕悲剧……他们往往在作品被公众承认以前就死了；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们遭受着为生存而斗争中的障碍与困难的不断压迫。”

这是梵高的名言，也是他的宿命。这位19世纪最伟大的荷兰画家，毕生穷困潦倒。近乎海量的创作作品是在他死后才开始名声大噪，一些作品到了20世纪末期被拍出天价。业内人士还认为品质更好的梵高作品因为收藏在多家收藏机构，否则还将创出更高价格。但在梵高在世时，他的作品仅卖出了一幅。有人分析，梵高死后走红，是因为市场炒作，以及这个特立独行的悲剧天才引发了同行和大众的同情。也有人倾向性认为，梵高早期画风偏于沉重阴郁，因而不为当时的评鉴、收藏机构所喜。

为什么梵高会成为美术史、艺术史上不可替代的巨匠人物？这要从摄影带给绘画的冲击说起。19世纪，摄影技术趋于成熟，从根本上动摇了绘画作为艺术的地位，视觉审美及其生产、消费不再为上层社会所垄断，摄影的简单易操作使得准确再现自然、人物不再是顶级画家的专利，没有经过绘画训练的人也可以轻松地拍下眼前的景物。这使得传统美术受到冲击，绘画不再以尽可能真切地表现物象真实为唯一目标，绘画的功能、表现形式与意义都必须发生转变。梵高正是这个转型期中的代表人物，从最初对现实主义画作的模仿，经不断蜕变与提升，成长为杰出的后印象派绘画大师。

台湾著名作家蒋勋所著的《蒋勋破解梵高之美》，是一本深入引介解读梵高创作生平与代表作品的佳作。对于那些希望更好地认知欣赏梵高作品、理解这个毕生生活在煎熬中却决不放弃“创造美的作品”冲动的伟大画家的读者来说，这样一本书正可谓恰当的入门读物。

全书首先谈到梵高的工农素描。1881-1885年间，梵高创作了大量以矿工及农民为主题的素描。这些画作的画风沉重阴郁，在当时很不受欢迎，梵高其实明白这一点，但他就是希望通过画作来见证当时那个时代，见证那些为生存压力所折磨甚至陷入绝望的个体、群体。梵高后来选择了自杀，很难说与他在这段时间所品读到的“无法救赎的绝望”没有关系。正如蒋勋所说，《哭泣的老人》、《在永恒的门口》、《吃马铃薯的人》等作品，直观地传达着画家对劳动者的同情，并升高为安静地凝视，赋予其生存的庄严。

梵高成长在一个有着简朴信仰的感恩家庭。蒋勋在书中简要介绍了荷兰的建国史、社会文化史，指出梵高在艺术上的狂热，与这个国家的信仰及文化传统有关。荷兰艺术经纪传统也使得梵高和他的弟弟都陆续成为艺术经纪人。通过艺术经纪工作，梵高接触到大量的现实主义和印象派画家的作品，更因为到了19世纪世界工业的“心脏”伦敦工作，接触到伦敦近郊最为贫穷的社区。这激发了梵高通过布道及艺术创作来救赎苦难的热情，他却因此被教会所放逐。事实证明，放逐造就了梵高，也因为让这个荷兰青年集中感受到了忧伤、疲倦、沮丧和绝望，而读懂了工农的心境。《吃马铃薯的人》是他面对工农生活的总结，他看不到任何救赎的希望，“油画色调仍然深沉郁暗，笔触滞重苦涩”。

梵高1885年造访安特卫普，接触到日本浮世绘等异样风格的作品，更在1886年结交了莫奈、高更等多名艺术界的主流画家。他的画作开始变得丰富多彩。在当时，巴黎的主流画家构想着人类文明的前景，关注城市化、工业化及因此带来的社会经济转型的破坏性。梵高很好地掌握了新的绘画技法，也接纳了主流画家的思想，即批判工业化、城市化迫害掠夺小农土地的观点。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梵高之所以能了解到日本浮世绘，恰恰是因为19世纪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催生出世界博览会，反过来又促进了全球各地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梵高的许多作品，引入了浮世绘多元视点、透视法的风格，创作更为自由开阔。

梵高生命末期的两大创作主题，一是向日葵，二是自画像。蒋勋在书中通过多幅向日葵作品的分析指出，梵高借助向日葵的意象，寻找着他想要的阳光，代表着他对友谊的渴望。梵高的自画像特别是自残之后创作的多幅自画像，传递出梵高试图以最无情和尖刻的方式展示灵魂的愿望，“只有疯狂，一个人可以如此诚实逼视自己”。这期间，梵高的创作热情上升到顶峰，无论从画作产量还是质量来说都是如此，也预示着悲剧谢幕即将到来。

《蒋勋破解梵高之美》
蒋勋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新书导读

《财富的孩子》
王大骐 著
鹭江出版社

他们是财富的孩子，也是时代的宠儿。他们和你一样的青春，却有着不一样的世界。他们努力摆脱父辈的阴影，试图成为真正的自己。一个被命名为“富二代”的群体，都在经历着成长的烦恼，都面临着同样的宿命：自我救赎。

《高跟鞋上的世界》
敦煌文艺出版社

高跟鞋的意大利文是Stiletto，即一种刀刃很窄的匕首，是一种完美的“凶器”。高跟鞋对于男人，也许不过是一双鞋；而对于女人，则不仅仅是一双鞋子那么简单，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要挑一双好鞋。高跟鞋于女人是一种“天赋女权”，是行走的艺术。

《重返五四现场》
叶曙明 著
九州出版社

五四前后是中国近代史上群贤咸集、大师辈出的年代，各种思想像山崩川涌，汇聚成滔滔巨流，相激相荡，引领风骚。本书再现了这个新旧政治、新旧文化交锋的大时代，细述民国政界与学界的风云往事。

中国管理往事

□ 任玲

企业管理中的领导艺术是门极深的学问。一直以来西方管理学在这方面的学说层出不穷，中国式的管理却似乎乏善可陈，事实上，中华五千年历史中有着许许多多关于中国化领导艺术的生动例子，段先生在新作《中国管理往事》中，以古今管理学经典例子为引，介绍了自古以来中国管理中的成败经验、历史故事。

书中“鸡鸣狗盗之徒在孟尝君团队建设里的作用与负能量”一章里面就讲述了孟尝君爱惜人才，招纳三千宾客，最终借助鸡鸣狗盗之士的力量逃离秦国，得保性命的故事，又引用了王安石在《读孟尝君传》中对此事的评论，继续深入挖掘，指出孟尝君在自身团队建设里犯下的几个严重错误，借此阐明领导者对集体进行统一的战略管控，统一的人力资源管控和统一的文化管控的重要性。指出了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组织治理体系、良好的组织框架体系、积极的人才发展战略、科学有效的文化管控在成熟的领导艺术中的地位及其必要性。归根结底，无论如何领导，企业还是由人组成的，只有加强人才储备，创造积极的企业氛围，从各种角度极大地提高员工素质，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运作效率，最终以精兵强将出师，才能用同样的时间达成其他团队所无法企及的成果。

除了以古人的失误对照管理中容易出现的疏忽外，段先生还介绍了“倒屣相迎”的蔡邕和大闹婚宴最终被捕处死的灌夫，借这两个古人的经历在领导艺术方面生发阐述，将管理上升到“善”与“恶”的角度，指出管理的实质其实也是教导组织中的成员选择和激活与扩展善的心智模式和行为模式并摒弃恶的成分，也就是扬善抑恶。

而对普通职员们来说，管理者是否具备优秀的领导艺术影响极大，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合适的领导方式可以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错误的领导方式则极易将企业带入困境。

《中国管理往事》
段俊平 著
新世界出版社

看艾柯怎样“颠倒”世界

□ 胡艳丽

读完《带着鲑鱼去旅行》，感觉安伯托·艾柯就像是一个才华横溢又愤世嫉俗的怪老头儿，他带着一副特别的眼镜，总能在人们习以为常的正常表象下，看到那么多不正常。经他一解读，好像整个世界都充满了荒诞，现代文明到处夹杂着反智的产物。

艾柯的所有的嘲讽都隐在了不动声色的文字之下。文中的小故事明明是虚构，却总让人感觉这个怪老头正躲在一边窃笑，他好像嘲讽的就是你——那个无厘头的制造者、各种混乱的承受者、诡异生活中的沉睡者。

该书开篇的小短文《带着鲑鱼去旅行》，为全书的讽刺笔法定了调：在一家以电脑为唯一沟通方式的高级宾馆里，人们只能识别、相信电脑语言。于是，因为电脑频繁故障，一条倒霉的熏鲑鱼和“我”共同成了牺牲品，鲑鱼被服务员两度请出了冰箱，开始散发臭味；而我因为两次搬出了冰箱里多得出奇的酒水，被电脑记下，成了有名的酒鬼，人品危机爆发。小故事读来起伏波折，如一道滋味十足、辛辣幽默的丰盛大餐，无限滋味，回味悠长。

宾馆在此不过是个漂亮的隐喻，电脑故障也不过是设个小埋伏。这个世界到处充斥着一套不那么好用，却自以为万能的“标准程序”，令人与人之间的交集瞬间清零，人们饱满的情感、生动的语言敌不过薄薄的文件、虚拟的程序。那么，我们被谁绑架了？文件、制度、程序、还是电脑、手机？都不是，说到底我们是被自己制造的“形而上”的制度绑架了，被自己绑架了，把自己绑成了一条倒霉的鲑鱼。

在《星际帝国传说》里，启明星膜翅类如米粒般大小昆虫即将在帝国最高司令部的指挥下与织女星壮如装甲坦克的士兵进行一场“血肉横飞”的友谊赛的情景，在《传说》中，所有荒诞情节背后都只有一个“王者”的声音——我是这里的最高统治……这个声音，他来自于自古以来的皇帝，来自于现代的官僚体系，来自于那些自从走上仕途就“情商”飞升，“智商”降到冰点以下的官员。传说中的一切都像极了政府文件中的暗语，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内，没有例外，如有例外一切按无例外执行！

艾柯把讽刺写得入魂入骨，且在全世界传播。此时，距作者写作这些文章的时间过了三十年左右，可很多情境仿若眼前。

人们说读不懂艾柯，却又似乎人人都读懂了几层意思。其实对于这位享誉世界、横跨众多领域的怪才而言，他的文章解读并没有标准答案，你感受到了几分意思他就有几分意思，你联想出多少意义他就有多少意义。

《带着鲑鱼去旅行》
[意] 安伯托·艾柯 著
中信出版社

在故乡安放流浪的心

□ 张帮俊

人生其实就是在不断地流浪，不断地寻找，上路、再寻找的过程。就像青年作家范泽木在他的散文集《我愿流浪在小镇》说的那样“找一僻静之所把不安的心，小心安放。”他的心灵之地就是故乡，一个叫“木棉塔”的美丽、宁静小镇。这本书既是作者对故乡的怀念，也是他对生活、人生的感悟。

故乡有他的童年往事，有最朴实善良的乡亲、有最念念不忘的情愫。无论走到哪里，这份故乡情一直萦绕心中，从不会丢弃。可是，多年之后，重回故乡，却发现，故乡少了些熟悉，多了份客气。自己好似变成了游客，回家就像完成仪式一样，即使走在儿时奔跑过的小路上，却再也无法重获儿时的心境。也许是因为时间改变了这一切，但说到底，是我们愧对故乡，而故乡却依然记得我们的乡音、乡貌。

“纷繁之外，总有这么一块土地，用最为缓慢的节奏亲近大自然的心。用耕作、播种、插秧、收割来诠释着乡村独有的魅力。”“多年之后，我依然记得那些收割芦苇的日子，那样的热闹与温馨，那样的坦然与真挚，那样的相濡以沫与诗情画意。”在作者的心里，故乡的记忆总是沉甸甸、温暖的。故乡是聆听树上漏下的蝉鸣；是拎着小火炉取暖；更是小镇上传来的吆喝声。这里的一切都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令人回味。远离城市的喧嚣以及那令人窒息的压力，在故乡，脱掉伪装的面具，放下疲惫的心，让心回归宁静与淡然。这或许就是故乡、乡村最让人动情的地方。适合停下忙碌的脚步，回归故乡，其实，也是提醒自己，别忘记了从何处出发。

在交通日益发达便捷的今天，在空间与距离都不成为问题时，乡村与城市两者之间联系变得更加紧密。走出乡村来到城市，带着故乡一起流浪，却很难融入。而当带着“城市人”的面孔重回乡村里，却又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何时变成了乡村的过客，陷入尴尬之中。

“身未动，心已远”。合上书，望着远处袅袅炊烟，思绪也随烟飘向远方的故乡。当有一天，我流浪累了，是否也会去故乡的老榕树下听听它的故事，捧一把故乡土，喝一口故乡水。

《我愿流浪在小镇》
范泽木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速读

为什么是他坐天下

□ 古秋建 整理

大汉开国皇帝刘邦是个流氓，大唐开国皇帝李渊是个贵族，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是个军官，大明开国皇帝是个和尚……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种是没有的，但确实有些规律可循。凭什么都是高官贵戚，李渊当皇帝，宇文化及却成了败类？有同样的出身和谋略，为什么李密反倒输给李渊？同是底层人逼上梁山，为什么朱元璋得天下，李自成败走北京？天下大乱的时候，有点勇气的都觉得机会来了，但在这场残酷的淘汰赛中，能否走到最后，先要问问自己具备没具备这样的素质。

有明确的目标

清朝乾隆年间，山东有个叫王伦的白莲教徒带领一群教众突发奇想，决定起义，他们几千人集结起来，一路向北行进，并顺利地打下了沿途行经的三个县城，没有遇到有力量的抵抗。他们表现得很像一支有组织有目标的队伍，对打下的县城都开县库劫库银，开监狱放囚犯，并对百姓们表示“我们只杀官劫库，不杀平民百姓”。初期的成功后他们就不知道下一步该干嘛了，想了想临清城比较大，不如先把那里打下来。他们围着巨大的临清城墙攻打了几天，生生把朝廷的“剿匪”队伍盼来，铁桶一般地把他们围起来进行了一场围猎。直到被杀、被抓，他们也没说清楚自己最终要干嘛。造反是件危险的活动，造反之前，你是否想明白了自己的未来？生逢乱世，强者生存。强者振臂一呼，带一群人占山为王是轻易可做的决定。占山为王之后呢？张金称带一群人，就是剽掠乡间；翟让比他好些，只劫过路行旅。如果说王朝末年的争斗是一场打怪的游戏，他们连第一关的关底都算不上。因为他们没有长远的目标，只为了活过眼前，多活一天算一天，也就谈不上更大的发展。

当然不是所有走到最后的人都从一开始就订立宏伟目标的，朱元璋最初参加起义军，不过是解决吃饭问题，本也打算在郭子兴手下当个好下属、好女婿。但时势造人，郭子兴早早去世，大任落在他肩上，既是责任所在，也是有了底气，朱元璋从此就开始有了远大理想，并按部就班地一一排除竞争对手，朝最终目标努力。他不定目标时，是因为有郭子兴撑着。但不管他还是郭子兴，是一支队伍的主导，就要考虑这支队伍的未来。在这个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战场上，要么拼命发展壮大争取做最终胜者，要么早早投靠他人。光想眼前的事情，危机也就在前面不远了。

有群众基础

你有目标，可你有人追随吗？没有哪个皇帝是靠孤身奋战可以上位的，你要有队伍、有下属、有支持你的群众。

群众基础是可以制造的，李渊就是个例子。他从筹备阶段到起事之后无时无刻不在收买人心——用“复兴先帝时代”来收买当朝贵族，用平反冤案来收买大隋异议者，用释放盗匪的方式来收买朝廷的反对者，用“秋毫不犯”、用谶语歌谣和祥瑞来收买普通百姓……制造群众基础是每一个有志于当政治家的人必须学会的技能。

有经验的政治家都做过同样的事，刘邦、朱元璋都编造过自己出生时神奇场面的谣言，刘邦说他母亲与龙野外交合生下了他，朱元璋说他降生时一片红光……当然这些也都不是他们亲口说的，而是让手下人散布出去的，以此来宣扬自己是神指定的天子。武则天篡位时明示暗示手下不停地进献祥瑞，以证明她的上位是天命。

就连袁世凯，想当皇帝之前也玩把戏，每次洗澡时都暗中放一些大片鱼鳞留在澡盆中，让打杂的看到，慢慢就传出去他是真龙天子之类的消息。夺取政权，靠枪杆子和笔杆子，所谓笔杆子，其实就是公关部、宣传队，为自己制造舆论基础，赢得群众支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是这水，是需要调动的。笔杆子的功用还在于解释政治家的行为。宇文化及杀了隋炀帝成了民贼，朱元璋干掉自己的主上小明王韩林儿却不影响他后来继续发展，禅位给李渊的隋恭帝莫名其妙病死，也没有人说李渊什么。仅仅是因为成王败寇吗？那为什么后梁太祖朱全忠杀了唐昭宗，成就了帝业，却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呢？区别就在于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上。朱元璋杀韩林儿，没有留下什么证据，在此后的对外宣传中，他的笔杆子修改了他早年与韩林儿的臣属关系，他再找个借口把当年负责动手的马仔廖永忠灭口，这件事就更死无对证了。明明是他为了夺取权位干掉障碍，经过笔杆子一番解释，就成为一场意外事件。李世民杀自己的兄弟逼父皇退位，之后也让笔杆子重修历史记录，将本来精明强干的哥哥写成一个庸碌又嫉妒的人，想置他于死地，而他的玄武门之变不过是迫不得已，生生把一个不孝不悌的行为变成了光荣正确。后梁太祖朱全忠是个粗人，根本不懂得文字的力量，自然想不到去操作这些。

成大事不拘小节

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是种美化的说法，实际上，对封建统治者来说，真正的意思是“成大事者不择手段，不守规矩”。他们可以用仁义礼智信要求属下，但轮到自己的时候却什么都可以不遵守，一切以结果为导向。

刘邦在对手威胁要杀其父亲时笑言“别忘分我一杯羹”，与项羽签订鸿沟协定中分天下之后又毁约暗算项羽；李世民为了争夺皇位亲手杀了自己的兄弟，还灭了兄弟的全家；朱元璋以反元为名参加革命，但真正的革命者在跟元军打的时候他在后方打汉人，扩充自己的地盘……

孝道和信义是古人最基础的价值观，这些“成大事的人”自己对他人也是用这个标准来要求的，刘邦称帝后不久就让叔孙通制定了尊卑有序的礼仪制度，让陆贾制定了“行仁义、尚德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他对传统道德不可谓不重视，但这些传统道德在他“成大事”的过程中却没有过多少体现。他用父做交易算得上不孝，逃命时从车上推掉孩子算是不爱，背弃协约算是不信，杀下属杀出生入死的兄弟算是不义。朱元璋执政时期的大明政权是最极端的传统道德捍卫者，但他自己呢？暗杀小明王韩林儿、罗织罪名清洗功臣，按传统道德标准都是不忠不义之举。

关键时刻，拼的是演技

李渊根本不想收留李密——李密那么强的号召力，他一降唐就有无数下属望风而降，令都不用下就有人以他的名义献军队献土地，这样的人留在这里，江山是他的还是李渊的？但李渊不说，还表现得对李密亲爱有加，让李密受不了挤兑主动走，给李密扣上个“降而又叛”的不义帽子，杀了他还保留了自己的正当名声。这演技比李密不知道高到哪里去，李密杀翟让，太直白了，毫不掩饰，这让旁观的人们怎么想呢？！

很多关键的时刻，权力圈拼的都是演技。鸿门宴就是一场奥斯卡颁奖礼，刘邦、樊哙、范增、项庄，哪个不是最佳男主配角？只有项伯和项羽傻乎乎当观众，真以为别人的表演都是真情流露，一个感动就被对方骗了。赵匡胤的黄袍加身真的是被人逼迫吗？

汉光武帝刘秀追随刘玄的时候，刘玄忌惮他们兄弟的实力，借刀杀了他的哥哥。刘秀得知消息先是跑去请罪，表示他哥哥是死有余辜，并用行动表现出一点不为他哥哥难过。如果他演得不好，他的命也就难保。真是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否则也就没有他的后来了。演技有多重要，看看王世充就知道。同样是演，王世充演得太着痕迹，太不专业，结果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

市面上出过很多分析开国皇帝素质的书，有分析他们的武德的，有从他们身上学创业之道的，其实无非是成王败寇，成事了的，做什么都有理，他们做的什么事都能有人从中找出优点来。军事能力谁没有呢？容人之量也是多数起事者的必备。可是为什么别人没有通关？实力够不够当然是第一位的，在实力够的情况下，就是看上面几个问题了，说得学术一点，就是：有没有长远计划，有没有制造足够合法性，是不是结果导向。成功并不是衡量一个人的唯一指标，在残酷的厮杀中，成事者未必是好人，失败者也未必不是强者，有时只是他们做出的选择不同。

本书褪去隋末“英雄好汉”的演义传奇色彩，客观分析隋末各种反政府势力的共性、个性，及其核心人物起事、失败的过程。以隋唐政权更迭为例，揭示了王朝盛衰背后权力角逐的历史定律。

《黄袍定律：为什么是他坐天下》
宋燕 著
九州出版社